

武汉大学

张建民

主编

历史学集刊

第二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大学组建后，历史学院为文学院下之一系。物换星移，时至今日历史学院已拥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还拥有有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三个省级重点学科（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三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历史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中心），是全国高校同类学科中专业门类最全、整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之一。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名师在这里汇聚，他们是：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诒冲、郭斌佳、杨人口、梁启东、方壮猷、谭成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珪、姚薇元、彭雨新、石泉。他们躬耕讲坛，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创建学科。其中，尤以唐长孺、吴于廑二位先生在武大历史系工作时间最长，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所作贡献最大。正因为前辈史家的辛勤耕耘，给我们创造、奠定了优良的学风和朴实严谨的治学传统，也给我们留下了继承与创新相统一这一水不过时的真理。

为总结我们后辈学习、继承前辈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今后努力方向，以及加强“211工程”项目与重点学科的建设，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作为《集刊》的前五集，先行集结了我院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教师近年的部分代表性论文。这些论文诚然不能完整反映出历史学院科研成果的整体情况，或许出于“敝帚自珍”，每个教师所自选篇章未必就是上好佳作，尚望“行家里手”不吝赐教。

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的经历，历史学院走过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艰难岁月；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也都给历史学系（院）的发展，带来了生机。面向未来，我们更应秉承先辈的遗训，继承、创新，继续努力，为我国的史学教育与研究，做出不辜负前人的成果。

今日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源远流长，上可溯自武大前身——建立于一九一三年的国立武昌高师之历史地理部，及至一九二八年国立武汉大学组建后，历史学即为文学院下之一系。物换星移，时至今日历史学院已拥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还拥有有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三个省级重点学科（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三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历史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中心），是全国高校同类学科中专业门类最全、整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之一。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名师在这里汇聚，他们是：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诒冲、郭斌佳、杨人口、梁启东、方壮猷、谭成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珪、姚薇元、彭雨新、石泉。他们躬耕讲坛，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创建学科。其中，尤以唐长孺、吴于廑二位先生在武大历史系工作时间最长，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所作贡献最大。正因为前辈史家的辛勤耕耘，给我们创造、奠定了优良的学风和朴实严谨的治学传统，也给我们留下了继承与创新相统一这一水不过时的真理。

为总结我们后辈学习、继承前辈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今后努力方向，以及加强“211工程”项目与重点学科的建设，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作为《集刊》的前五集，先行集结了我院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教师近年的部分代表性论文。这些论文诚然不能完整反映出历史学院科研成果的整体情况，或许出于“敝帚自珍”，每个教师所自选篇章未必就是上好佳作，尚望“行家里手”不吝赐教。

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的经历，历史学院走过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艰难岁月；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也都给历史学系（院）的发展，带来了生机。面向未来，我们更应秉承先辈的遗训，继承、创新，继续努力，为我国的史学教育与研究，做出不辜负前人的成果。

今日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源远流长，上可溯自武大前身——建立于一九一三年的国立武昌高师之历史地理部，及至一九二八年国立武汉大学组建后，历史学即为文学院下之一系。物换星移，时至今日历史学院已拥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还拥有有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三个省级重点学科（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三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历史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中心），是全国高校同类学科中专业门类最全、整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之一。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名师在这里汇聚，他们是：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诒冲、郭斌佳、杨人口、梁启东、方壮猷、谭成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珪、姚薇元、彭雨新、石泉。他们躬耕讲坛，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创建学科。其中，尤以唐长孺、吴于廑二位先生在武大历史系工作时间最长，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所作贡献最大。正因为前辈史家的辛勤耕耘，给我们创造、奠定了优良的学风和朴实严谨的治学传统，也给我们留下了继承与创新相统一这一水不过时的真理。

为总结我们后辈学习、继承前辈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今后努力方向，以及加强“211工程”项目与重点学科的建设，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作为《集刊》的前五集，先行集结了我院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教师近年的部分代表性论文。这些论文诚然不能完整反映出历史学院科研成果的整体情况，或许出于“敝帚自珍”，每个教师所自选篇章未必就是上好佳作，尚望“行家里手”不吝赐教。

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的经历，历史学院走过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艰难岁月；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也都给历史学系（院）的发展，带来了生机。面向未来，我们更应秉承先辈的遗训，继承、创新，继续努力，为我国的史学教育与研究，做出不辜负前人的成果。

今日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源远流长，上可溯自武大前身——建立于一九一三年的国立武昌高师之历史地理部，及至一九二八年国立武汉大学组建后，历史学即为文学院下之一系。物换星移，时至今日历史学院已拥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还拥有有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三个省级重点学科（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三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历史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中心），是全国高校同类学科中专业门类最全、整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之一。

第二辑

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

主 编 张建民

执行主编 陈 锋

编 委 会 陈 锋 陈 伟 陈 勇 冻国栋
冯天瑜 何德章 胡德坤 李工真
李少军 王 然 徐少华 向 荣
杨 果 张建民 朱 雷

编辑部主任 刘 超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 第二辑/张建民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0

ISBN 7—216—04573—4

I. 武…

II. 张…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038 号

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 第二辑

张建民 主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593 千字
版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7—216—04573—4/K·476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30.25
插页:1
印次: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	何德章(1)
六朝时期的水陆交通·····	何德章(16)
唐代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	鲁西奇(25)
影钞本《皇明条法事类纂》未分卷文书初考·····	张建民(58)
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	张建民(83)
主客之间:明代两湖地区土著与流寓的矛盾与冲突 ·····	杨国安(101)
明清农业垦殖论略·····	张建民(112)
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	任 放(135)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	任 放(149)
20 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 ·····	任 放(165)
明清养济事业若干问题探析·····	周 荣(191)
清前期耕地面积的综合考察和重新估算·····	周 荣(205)
永佃权与清代农民生活·····	周 荣(220)
社会动荡与清代两湖地方士绅阶层·····	杨国安(230)
社会动荡与清代湖北乡村中的寨堡·····	杨国安(245)
试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田水利·····	张建民(252)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探·····	周 荣(268)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任 放(289)
施坚雅模式的学术效应·····	任 放(311)
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	周 荣(327)
册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税征收·····	杨国安(340)
论康雍乾时期的蠲赋与减租·····	张建民(354)

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	陈 锋(371)
清代财政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	陈 锋(392)
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	陈 锋(421)
20 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 ·····	陈 锋(442)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	陈 锋(467)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

何德章

隋代大运河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河流，成为隋唐帝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迄今仍被利用，是古代中国一个伟大的工程。但早在隋炀帝修筑大运河以前，通过人工渠道联系自然河流，业已形成跨越南北的水路交通，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分裂，在运渠畅通的时候，一个人要从当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乘船北上，越长江、淮河、黄河，通过河北平原腹地的人工运河进入今天津市区，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可以说，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分裂政权不断开凿而隐隐形成的这一人工水道，促成了隋统一以后大运河的开凿。

一、联系钱塘江与长江的人工水道

《史记》卷29《河渠书》称早在先秦时：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

所谓鸿沟，即汴河，则从先秦时即有人工渠道连通黄河与济、汝、泗水，达于长江。“通沟江淮间”当指吴凿邗沟至江达淮北进中原之事^①。至于“三江、五湖”，《集解》引述三国吴人韦昭的意见：“五湖，湖名耳，实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吴西南。”《索隐》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东北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海，故《禹贡》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

^① 《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

璞《江赋》云具区、洮滈、彭蠡、青草、洞庭是也。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司马迁本人认为三江五湖是指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上的河流湖泊，所以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长江下游今宁绍平原、太湖流域，未全面开发之时，河流众多、湖泊密布，所谓“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注，触地成川，枝津交渠”^①。其地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②。早在先秦即通过人工连通河流湖泊，形成由今绍兴达于长江的水道，于史有征。《越绝书》卷2《外传记·吴地记》称：“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渚，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这是指从今苏州抵达长江的水道。同书卷6《外传·记策考》称吴王夫差兴兵伐吴，战于就李，“大风狂发，日夜不止，车败马失，骑士堕死，大船陵居，小船没水。”“就李”《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记为“槁李”，《集解》引西晋杜预语，称：“吴郡嘉兴县南有槁李城也。”则从今苏州南至今嘉兴当时亦通水道，这与大运河走向一致。同书卷8《外传·记地传》亦称：“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从山阴即绍兴至上虞间的水道。吴伐越以舟师，越攻吴亦然。《国语·吴语》称越王勾践趁夫差北上争盟而灭吴，“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不仅范蠡所率为“沿海溯淮”的部队为舟师，勾践必“溯江”入吴，最终消灭吴国都城附近的水军，所率中军亦当以水军为主^③，则从会稽亦有水道北通至吴，不仅能通行租赁舴艋小舟，亦能行驶较大的战舰^④。

这条久已形成的水道，魏晋时仍不断改进利用。《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南徐州”条说：“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说明孙权创业时，利用的正是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与吴郡、会稽间的水路交通，控制江东，并转运吴、会粮食，向长江中游发展。由于这一水道需要穿越常州、镇江间宁镇山脉形成的丘陵地带，地势高而土薄^⑤，通航不易。据称孙吴末

① 《水经注》卷28《沔水中》。

② 《淮南子·齐俗训》。

③ 参蒙文通：《吴、越之舟师与水战》，收于氏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太平御览》卷315引《越绝书》曰：“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可见其时战船情形。

⑤ 《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润州”条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坚如蜡。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

年,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②,应是对这条水道的大规模整治。西晋末,陈敏于此间筑练塘,东晋初年晋陵内史张闾费21万功(功为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作量),修新丰塘^③,利于农业灌溉,但同样亦利于水道交通,至北宋时还被利用^④。《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袁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亦属对此条人工水道的整治。

吴黄龙元年(229),孙权最终择都建业,加强对三吴内地的政治控制,借重吴、会财源,初亦利用吴、会至京口间的水道。嘉禾六年(237),孙权命左台侍御史郗俭为监工,“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⑤。吴、会粮运当亦由京口溯江西上,入秦淮河,复经运渎运至仓城。运渎而外,复有东渠、漕沟,作用亦同^⑥。

由于此一水道须由吴、会向北至京口,再溯大江西上180里入秦淮河,途程迂远且常为风涛所阻,遂有新开运河之举。《太平御览》卷73《地部·堰埭》引《吴录》:“句容县,大皇时,使陈勋开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吴会诸郡,故船不复由京口。”《建康实录》卷2赤乌八年(245)八月条说:

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至支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

《建康实录》的作者许嵩自注说:

案:其渎在句容东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初东郡船不得行京(口)行(长)江也,晋、宋、齐因之。梁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遂废之,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预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岗。至隋平陈,乃诏并废此渎。

① 按:丹徒即镇江,云阳即今江苏丹阳。

② 《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润州”条引《吴志》。

③ 参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④ 《宋史》卷96《河渠志》:宣和五年(1123)五月,“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

⑤ 《建康实录》卷2。

⑥ 《建康实录》卷2:赤乌四年(241)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自注说:“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

“破岗渚”意即掘断山岗而成的水渠。该渠在今江宁(时称湖熟)县东境立埭堰断秦淮河,抬高其上游水位,使其得以行船,利用秦淮上游河道,经过今江宁龙都、湖熟、杜桂、赤山湖,接句容渚。句容渚截断茅山山脉北缘与宁镇山脉南缘间东西向的山丘,全长30多华里,起至今句容小其,中经何庄庙、毕墟村、鼋龙庙、吕坊寺,在今江苏丹徒宝埕镇接香草河,最后与原晋陵—京口间的运河相接,从而连通吴、会水道^①。这条人工运河穿越山岭,地势较高,水源有限,所以30多华里的渠道上设置14道拦河堰(埭),节节调蓄水位,形成一个个人工船闸,船只过埭,需用人工或牛力牵引,冬日水枯或遇旱则难通行。《梁书》卷53《良吏·沈瑀传》说:“湖熟县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为艰难,(齐明)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开四洪,断行客就作,三日立办。”梁朝废破岗渚,另凿句容渚,新渠55里,立21埭,亦属改善运道之举,《建康实录》所谓避太子萧刚讳而废破岗渚,当属民间传言,不可从信,萧刚生于梁朝建立后,如需避讳,命名取字时就应想到,不必等到事后如此大兴事力。

东晋南朝破岗渚或句容渚虽属联系吴、会的便捷水道,利于公私行旅,但运输能力毕竟有限,“要想依靠破岗渚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挠,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岗渚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运输枢纽,仍然是京口。”^②《陈书》卷12《徐度传子敬成附传》:“吴明彻北讨,出秦郡,别遣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江由广陵。”这一史实说明,直至陈时,吴、会大型船只还须通过京口水道入江。

如前所述,东晋南朝,京口至会稽间的水道在晋陵至京口亦即今常州至镇江间,并非畅通无阻,徐敬成由吴兴入江,“引埭上溯”亦说明这一点。会稽至吴郡间的水道,在经过今杭州附近时,亦有多重堰埭,以人牛力牵引过往船只,遇旱为保证灌溉用水,则难通行。《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传子郭平原附传》说:郭平原为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又以种瓜为业。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渚不复通船,县官刘僧秀愍其穷老,下渚水与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减溉田之水,以通运瓜之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塘货卖。每行来,见人牵埭未过,辄迅楫助之,己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后人未及,常停住须待,以此为常。”钱塘即今杭州附近最有名的堰埭,当属西陵埭及其附近由数道堤堰构成的柳浦埭,为当时行旅往来的必经之途,因而此处过埭税亦相当可观。《南齐书》卷46《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说:南齐永明六年,“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

^① 参王引:《六朝时期的方山埭与“破岗渚”》,收于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②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西陵戍当即防遏警卫此处堰埭而设,因而附带收税职能。另外,会稽附近有回踵埭、都赐埭^①,当亦有助于水运。

二、长江、黄河间水道的拓展利用

连结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水道,以淮河为中心,淮河以北利用从河南、山东东南入淮的颍水、涡水、泗水等河流及附近湖泊,通过人工建造的堰渠调蓄水源,以达黄河;淮河以南则利用人工渠道沟通湖泊与河道,与长江相通。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作为南北争夺的中心地区之一,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水经注》卷6《淮水注》对于自长江入淮河的水道有较详细的叙述:

淮水右岸,即淮阴也。……县有中渚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旧江[渠?]水道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谓之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中渚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梁湖。(中渚水)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邱?],乃至山阳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耶[邱?].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故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濊,百里渡湖者也。”

据上述记录,吴王夫差从今扬州东南60里的长江边开掘深渠,引长江水东北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复北流与樊梁湖汇合;在樊梁湖东北开凿人工河道,引水东北流,汇博芝湖、射阳湖;又在射阳湖西北凿渠引水至淮河边的山阳城(即淮阴城,亦即今淮安)。夫差在长江引水口同时修筑邗城,所以这条渠道被称为邗沟,亦即《水经注》所说的中渚水。据《水经注》,汉末建安年间陈登因中渚水先东北流至射阳湖,复西北至山阳城,途程“纡远”,且射阳湖水体辽阔,有风涛之险,加以改建。樊梁湖

① “山阴回踵埭”,见《宋书》卷100《自序》;山阴城外三里处有都赐埭,见《梁书》卷51《处士·何点传子何胤附传》。其为二埭还是一埭两名,难以确定。

至长江沿邗沟旧迹,从樊梁湖正北凿渠至津湖,再由津湖正北凿渠 100 里引水至马漈(即白马湖)^①,再从白马湖引水入射阳湖西缘而至山阳城。亦称为中渚水。田余庆师指出:“改道后的中渚水,在三国两晋时期发挥了颇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效用。吴太平元年(256),吕据、唐咨等军自江都入淮泗以伐魏,曾利用过这条水道。西晋末年陈敏出为广陵度支及广陵相,漕运江南米谷以济中州,也利用了这条水道。或许陈敏在利用中有所修治,才造成了《水经注》中的错乱。晋代祖逖、桓温、刘裕等人从江南经略中原,都曾由此道北出。谢灵运《撰征赋》:‘发津潭(津湖)而迢迢,逗白马以憩岭,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这里所说的,就是义熙十二年(416)他自己受命劳刘裕北伐军时循中渚水入淮的经过。”^②

田先生所说“《水经注》中的错乱”,指引文中“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这一史实,《水经注疏》中熊会贞认为,此“永和中”当因涉上文“永和中,江都水断”一句而误,西晋末人陈敏如有改创,当在晋惠帝末永安或永兴(同为公元 304 年)时。而引文中蒋济《三州论》中的“陈登”,《水经注》别本又作“陈敏”,以魏初人而述 80 年后西晋末事,更属无稽。但无论将上述改作系于汉末的广陵相陈登还是西晋末的广陵相陈敏,抑或二人均有创树,亦不能解释引文中“永和中,江都水断”及“兴宁”时中渚水再一次改道之事。如《水经注》所述有征,则在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2),中渚水长江引水口一度阻塞,至晋哀帝兴宁年间(363—365)又加恢复,并改变陈登或陈敏时中渚水的路线,在白马湖南端凿渠引水,沿白马湖东岸,达于白马湖北口,从而避开白马湖的风涛。按兴宁元年九月桓温率舟师北伐,兴宁年间中渚水改建当因此事而起,事在兴宁元年正月至九月之间。《南齐书·州郡志上》“北兖州”条称东晋穆帝永和中北伐时说:“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查《晋书》卷 8《穆帝纪》,荀羨于永和八年三月镇淮阴,则其时中渚水道犹未阻塞。

《晋书》卷 79《谢安传》称谢安于淝水之战后于广陵附近建新城,“筑埭于城北,后人追思之,名为召伯埭。”《太平御览》卷 73《地部·堰埭》引《述征记》说:“秦梁埭到召伯埭二十里,召伯埭至三枚埭十五里,三枚埭到镜梁埭十五里。”今江苏扬州北有召伯湖,当因召伯埭而得名。当谢安屯新城时,谢玄等正越淮河沿泗水经营北方,召伯等堰埭当是为了改善中渚水南段运输而修筑的。直到陈朝,中渚水仍为南方北上的通道^③。

汉末魏初,曹氏与孙吴争夺淮河流域,就曾调集大量水军南下。《三国志》卷 1

① 按白马湖应属今高邮湖的一部分。

② 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收于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13 页。

③ 见《陈书》卷 9《吴明彻传》。

《武帝纪》:建安十四年,“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卷2《文帝纪》:黄初五年,“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行还许昌宫。”次年,“五月戊申,幸谯。……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渦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同书卷14《蒋济传》说,黄初六年(225),魏文帝曹丕率军南下至广陵以图攻吴,“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济以为东近湖,北临淮,若水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本历适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蹶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精湖”即“津湖”,曹魏水军战船数千艘,正是利用中渎水从北方抵达广陵。同书卷5《后妃·文德郭皇后传》称:“六年,帝东征吴,至广陵,后留谯宫。时表留宿卫,欲遏水取鱼。后曰:‘水当通运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当复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车所不足者,岂鱼乎?’”则曹魏不仅以水军出战,后勤保障亦多赖水运。

黄初五年曹丕率水军至广陵,所取水道为“循蔡、颍,浮淮”,而达寿春(今安徽寿县),沿淮而东至淮阴,再从淮阴循中渎水南至广陵;次年则从谯(今安徽亳县)沿渦水达淮河。郭氏以“水当通运漕”而拒绝“遏水取鱼”,则表明南下水道水源紧张,并非畅通无阻,因而建安十四年曹操在谯治水军沿渦水至合肥,只能造“轻舟”。《三国志·文帝纪》记黄初六年三月有,“行幸召陵,通讨虏渠。”据谭其骧先生考证,讨虏渠西起河南漯河,东抵河南周口,连结汝、颍二水上游^①。讨虏渠虽利于河南腹地水运,但从“讨虏”之名可以推断,主要还是使汝、颍二水相互调节,利于东南通淮。

当曹魏后期执政的司马懿试图加强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时,邓艾主张对京师通往淮河的运渠进行大规模整治。《晋书》卷26《食货志》说:“帝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邓艾主持的淮河南北屯田,成效显著,为治史者所习知,而运渠也得到很大改善。据该《志》,邓艾建议“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卷28《邓艾传》称:“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

① 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两晋时期”,7—8幅,索引坐标⑤—3。

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书》卷1《宣帝纪》记其事于正始三年(242),称是年,“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

治史者往往对邓艾建议实施后,淮河流域屯田的实效关注过多,而对于其水道改善不置一词。《水经注》卷22《沙水注》说:沙水过陈县(今河南淮阳)北,“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废兴,沟渎尚夥。昔贾逵为魏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里余,亦所谓贾侯渠也,而中渠复,交错畛陌,无以辨之。”百尺渠地当今河南沈丘,据《水经注》,沙水上承渠水,亦即蒺荡水或蒺荡渠,《汉书·地理志》称为狼汤渠,《水经注》同卷径称为渠水,此水在茱阳北与黄河相接,南北向,南结颍水,为睢水源头,又与泗水支流相通,《水经注》卷五称该渠乃“大禹开茱泽,开之以通淮、泗”,自古即是黄河通往淮河的水道枢纽。《晋书·食货志》所说淮阳、百尺二渠与《水经注》所说广漕渠不知是否为一回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7—8幅《三国·魏》在今河南沈丘标有百尺堰,当即百尺渠,与《水经注》所谓广漕渠位置相符。而淮阳渠不详所在,个人认为《晋书·食货志》“淮阳渠”为“睢阳渠”之误。《三国志》卷1《武帝纪》记:建安七年(202)正月,“公军譙……遂至浚仪,治睢阳渠”,地当今河南商丘南。从前述曹操从譙率水军沿涡入淮以达合肥这一事实看,曹操治睢阳渠,当属引睢水南接涡水,补充涡水水量,利于与老家譙郡的水路交通,为即将发动的袁、曹官渡之战作准备。邓艾要改善东南漕运,步曹操后尘,“修广”睢阳渠为情理中事。

邓艾《济河论》文字无存,但其主旨当为“开河渠”或“引河入汴”。并许昌左右的稻田用水以济运渠,水源毕竟有限。《晋书》卷47《傅玄传傅祗附传》说:“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滥,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邓艾“开石门”当即于黄河南岸修立石堰,束黄河之水勿使漫流,并置水闸,开闭有时,需要时开闸引黄河水入济水,复入泗水,以助运漕。泗水入淮处即所谓泗口,在淮阴上游不远处,更利于北方水军利用中渚水道南下。时黄河中下游沿线,地称石门者非惟一处,邓艾所开石门,当位

于汴水与黄河相接处^①。此石门一开,既能引黄河水注于泗水,亦能通过蕲荡渠下注汝、颍,兖、豫受益,石门成为控辖淮河北各支流的总枢纽,亦因此成为十六国及东晋时南北军事争夺的战略要地。

《晋书·食货志》及《邓艾传》所谓“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无水害”所指,为水运之道无乏水之虞,对于农耕的破坏却非常严重,西晋建立后,淮河流域水灾频繁发生,杜预等主张毁坏邓艾主持修建的新陂,同时指出:“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杜预所说“旧渠”,应即曹丕时曾利用过的汝、颍、涡水,邓艾设计的新运道,主要利用偏东的泗水河道,并筑泗陂等新陂,加以调蓄,以保证运道畅通。据《志》,对于杜预等决坏新陂的主张,“都督度支方复执异”,杜预指出:“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郡县要发展生产,而度支、都督或军家偏重之“利”,在于运道畅通,因而发生争执。这说明当时要保证从洛阳到淮河的水运畅通,殊为困难,甚至要以破坏农业生产为代价。

西晋咸宁元年(275)的这场“军家与郡县”之间的争论,最终郡县占了上风,朝廷采纳了杜预等人的意见,这也意味着邓艾为防范“东南有事”而建立的通过泗水从洛阳到淮上畅通的水道,运输能力弱化甚至丧失,汝、颍二水重又成为通向淮南的主要水路,而其时西晋正筹划灭吴战争,表面上让人难以理解。我们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当时西晋业已据有巴蜀,水路进攻的主要方向为王濬在长江上游重新组建的水军,出奇兵顺流东下,而不是通过汝、颍或泗水,浮淮循中渚水达于广陵。是后西晋灭吴,下游二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江军王浑出江西取横江,进军路线均为皖北,未见有大规模的水军。

① 《水经注》卷5《河水五》“(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蕲荡水出焉”下注说:西汉末,“河汴决坏,未及得修,汴渠东侵,日月弥广,门间故处,皆在水中。”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从荥阳至黄河入海口,千里之地,“十里一水门,更相回注,无复渗漏之患”;东汉顺帝阳嘉中,“又自汴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渠”;东汉灵帝时,“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邓艾“开石门”,“引河入汴”,当因曹魏初,黄河决口,“河济泛溢”,汴口石门阻塞,遵东汉旧迹而改建。前秦苻坚发起淝水之战,“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经石门而达汝、颍,此石门当即邓艾所开之处。从“自河入石门”可知,此石门距黄河干流还有一段距离,从东晋南朝争夺石门的相关史实看,其位置当在今河南荥阳境。《水经注》卷7《济水一》说:“济水又东,合荥渚,渚首受河水,有石门,谓之荥口石门也。……荥渚又东南流,注于济,今无水。……济水与河,浑涛东注,自西缘带山隰,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刘遵考仍此渠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今则南渚通津,川涧是导耳。”东晋时桓温、刘裕北伐所争之“荥渚石门”,无疑即邓艾所开之石门。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战争频繁,从黄河至淮河的水路不可能维修整治,但其利用价值仍在。公元383年,前秦苻坚举国伐晋,虽亦打算组建水军从巴蜀东下,袭“王濬楼船下益州”之故伎,但无疑将淮河流域作为主攻方向,“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①。

南朝梁时,史学家沈约观察当时南北对峙形势,有如下的分析:

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梗楠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毡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虞诩所谓“走不逐飞”,盖以我徒而彼骑也。因此而推胜负,殆可以一言蔽之。

沈约认为南北分裂是由地理形势决定的,并且认为政治上的分裂会因南北地理上的隔绝而长期维持下去,显然是错误的,但就东晋南朝的史实来说,沈约的分析也有一定道理。地处舟楫之乡,习于水斗的江南政权,在东晋及刘宋中期以前,常将其“楼船之夫”越过黄河,逐鹿于中原,或者依赖黄、淮间的水道作为后勤保障,但并不稳定的黄、淮间水道,或因北方政权扼据要津,或因水源缺乏,运漕不继,声势浩大的进攻往往铩羽而归,甚至全军覆没。不过,这些军事行动毕竟证明了其时黄淮间水道的情况,有必要加以简单叙述。

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趁十六国后赵乱亡之际北进,“中军将军殷浩帅众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遂戍仓垣”。^②《晋书》卷98《桓温传》记其事说:“温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戴施据石门得手,殷浩未循泗水,而是溯淮达寿春(即寿阳),率众7万欲沿颍水进据许昌、洛阳。因前锋姚襄倒戈兵败颖上而返。

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率众5万北伐前燕。“军次湖陆,攻慕容暉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遂至枋头。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③。湖陆、金乡地当今山东鱼台东南及金乡,当初殷浩没按桓温的意见“淮、泗入河”,桓温自己则加以实践,从泗口

①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② 《晋书》卷8《穆帝纪》。

③ 《晋书》卷98《桓温传》。

沿泗水北上,通过凿渠引巨野泽湖水而达黄河^①。在其沿泗水北进的同时,遣袁真沿汴水或睢水向西北进军,争夺石门,保障漕运^②,但前燕“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粮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③。石门未开、陆运被断,桓温虽已率军溯河至于枋头,结果大败而归,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桓温枋头之役后,南方北进基本上沿泗水水道,这一选择既是受北方局势限制的结果,泗水水道比之汝、颍等水道,更易于通航也应是重要原因。

淝水之战后,东晋趁机北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渦、颍,经略旧都……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山,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④吕梁山当今江苏徐州东南,为泗水所经之地。谢玄立七埭断吕梁山,当然是为了保障泗水漕运畅通,同时这也说明谢玄在淝水战后经营的重点是以彭城(即徐州)为中心的泗水沿线,并没有“径造渦、颍,经略旧都”。吕梁山从此成为彭城东南扼据泗水水道的重镇,取代石门成为南北争夺战略要地。

东晋末刘裕灭立国今山东的南燕及消灭关中的后秦,所取水道均泗水。《宋书》卷1《武帝纪上》记刘裕灭南燕的行程说:“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公至下邳,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同书卷2《武帝纪中》记义熙十二至十三年,刘裕率军攻后秦的行程及相关处置说:

九月,公次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先是,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步向许、洛,羌缘道屯守,皆望风降服。伪兖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归顺。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台。十月,众军至洛阳,围金墉。……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次潼关。三月庚辰,大军入河。索虏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公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公至洛阳。七月,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九月,公至长安。十二月庚子,发自长

① 巨野泽是当时沿泗水入黄河的重要补充水源。《宋书》卷64《何承天传》记其御边之策,其中说:“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御敌之要也。”

② 《晋书》卷81《毛宝传子穆之附传》说:“温伐慕容暉,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引汶会于济川。”据《水经注》卷26,汶水源出泰山,北流汇潍水入海,与清、泗无涉。可见桓温此次北伐,为保障泗水入河水路畅通,对周围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③ 《晋书》卷111《慕容暉载记》。

④ 《晋书》卷79《谢安传谢玄附传》。

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严息甲。

《魏书》卷35《崔浩传》记其事说:“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溯河西上。”实即桓温北伐时所走水道。刘裕回程则从“开汴渠以归”彭城,所用大致为昔日邓艾所设计的水道。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再一次“北伐”以图遏止北魏对河南的进攻,他认为:“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碣磬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①“及大举北征,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谟向碣磬,戍主奔走,遂围滑台”^②。进军路线亦为清、泗入河这一水道。不过因王玄谟处置失宜,兵败滑台,这年冬天,北魏皇帝亲率骑兵一直攻到长江边的瓜步,南宋词人辛弃疾所谓“元嘉草草,只赢得仓惶北顾”。

元嘉二十七年以后,南朝政权开始向淮河一线退缩,其水军再未到达过黄河。宋明帝泰始二年,宋将沈攸之奉命进攻北魏将领薛安都于彭城,“攸之等米船在吕梁,又遣军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为虏攻覆米船,又破运车于武原,攸之等引退,为虏所乘,又值寒雪,士众堕指十二三”。次年秋,“太宗复令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清、泗既干,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反者七”^③。南朝最后一次利用清、泗水道越淮河北进,为陈太建九年(577)吴明彻北伐。“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明彻频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复敢出。明彻仍连清水以灌其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诸将闻之,甚惶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马主裴子烈议曰:‘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岂可得乎?不如前遣马出,于事为允。’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帅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势以退军,冀其获济。及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不得渡,众军皆溃,明彻穷蹙,乃就执”^④。

由于北方传统上不习惯用船,北魏稳定地控制兖、豫以后,从黄河至淮河的水路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魏书》卷79《成淹传》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碣磬,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

①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② 《宋书》卷76《王玄谟传》。

③ 《宋书》卷74《沈攸之传》。

④ 《陈书》卷9《吴明彻传》。